改革开放 40 年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演进

贾　晋，高远卓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通过测算 1981—2016 年中国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发现中国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出“高—低—高”的变动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时序对各阶段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扭转城市优先发展的有偏政策，推行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战略，是缩小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差距的根本举措，而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以及提高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是城乡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关键。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城乡资本配置；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9)01－0024－09

一、引言

中国农村 40 年经济发展历程的本质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不断被市场机制配置的过程。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更加强调了资本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农村地区始终面临资本要素的短缺问题，其原因在于农村资本大量流向城市[1]。因此，研究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对于加快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要素报酬理论认为，受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人均资本较低的地区资本边际回报率较高，大量资本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而流向人均资本较低的地方，直到各地区的资本边际回报率相等，从而达到均衡状态。由此可以推断，在城乡资本能够自由流动的经济环境下，由于人均资本较低的农村地区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往往高于城镇地区，资本将从城镇持续流向农村，最终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将达到趋同。因此，如果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则说明城乡资本存在错配问题。

为了考察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演进趋势，需要对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进行有效测算。辛祥晶等[2]、彭小辉等[3]、周月书等[4]对中国不同时期的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分别进行估算后，发现中国农村的资本边际收益率一直远高于城市，且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值呈增大趋势。而高帆等[5]通过优化资本边际收益率测算逻辑，重新估算中国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后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即中国城镇资本边际收益率始终高于农村。对现有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估算方法进行梳理后我们发现，其在方法测算和口径确定等方面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不少研究将第一产业数据作为农村数据，忽视了农村第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城乡资本边际收益

收稿日期：2018－10－12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9.01.0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03212)；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ZDF1801)

作者简介：贾　晋(1980—)，男，山西原平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公共政策。E-mail：34481638@qq.com

率重新进行科学的测算。

此外,已有对于农村改革发展阶段的研究,往往以历史重大事件为节点来定性划分,缺少定量依据。例如孔祥智等[6]根据发展内容和成就将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鲜有研究从城乡资本配置效率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和动态研究,并将不同阶段的“三农”政策与城乡资本配置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据此,本文将根据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的测算结果对中国农村经济 40 年来的改革发展进行趋势划分,以期为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理论研究提供补充。

二、政策偏好对城乡资本收益率差异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不同发展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快速赶超阶段,往往会遵循城镇优先发展战略[7]。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在政策上涉及价格、投资、税收、金融等环节。价格政策方面,通过实行“剪刀差”政策来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以此获取农业剩余用以补贴工业化。在公共投资上,政府通常采取向城镇工业部门倾斜的投资政策,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在税收政策上,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征税力度,却在公共投资和利益分配方面对农村少有惠及。在金融渠道上,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农户存款从信贷渠道再次回流到城市地区,即农村资金通过“金融城镇偏向”流向城镇[8]。

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对城乡资本配置的影响如何通过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变动来体现?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政府在价格、投资、税收、金融等方面采取城镇偏向性的政策行为,导致大量资本从农村流向城镇,从而使城镇和农村的资本出现错配现象。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流向城镇的巨额资本使得城镇资本边际收益率开始快速收窄,而农村区域资本的短缺导致该地区资本边际收益率逐渐上升,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在城镇和农村地区产生的不同效应导致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值呈现扩大的趋势,具体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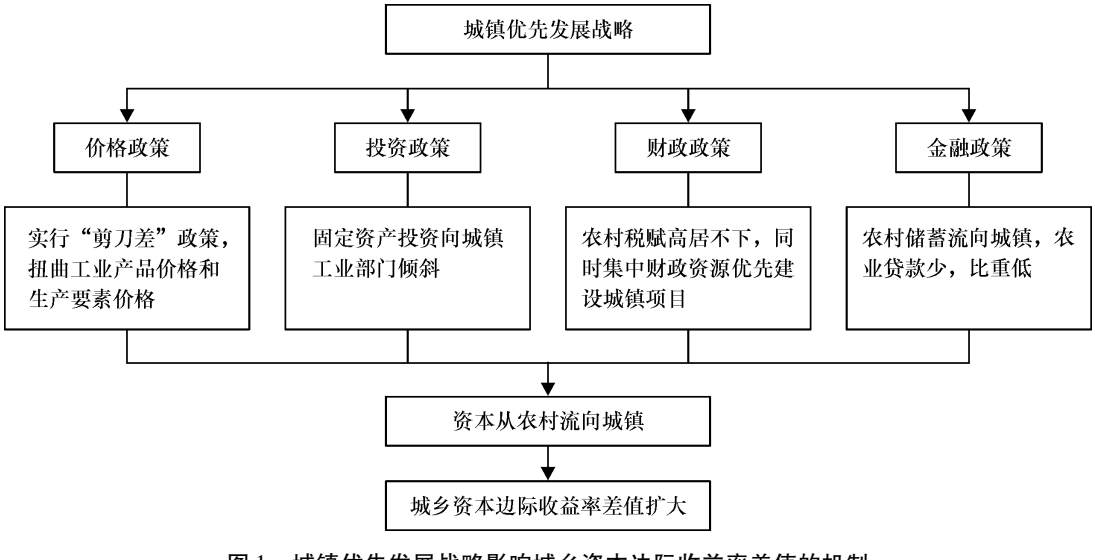


图 1　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影响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值的机制

而在城乡统筹发展阶段,政府开始推行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同时更加注重城乡资本的有序流动。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在政策上同样涉及价格、投资、税收、金融等方面。价格政策方面,通

过实施“托市收购”等政策提升农产品价格来对农业予以补贴。在公共投资上，政府采取向农业部门倾斜的投资政策，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在税收政策上，政府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和利益分配方面力度。在金融渠道上，对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同时通过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大宗农产品期货等来分散农村信贷风险。

与城镇优先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结果相反，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使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得到快速提高，并给农村资本回流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村地区资本边际收益率逐渐下降，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值开始缩小。具体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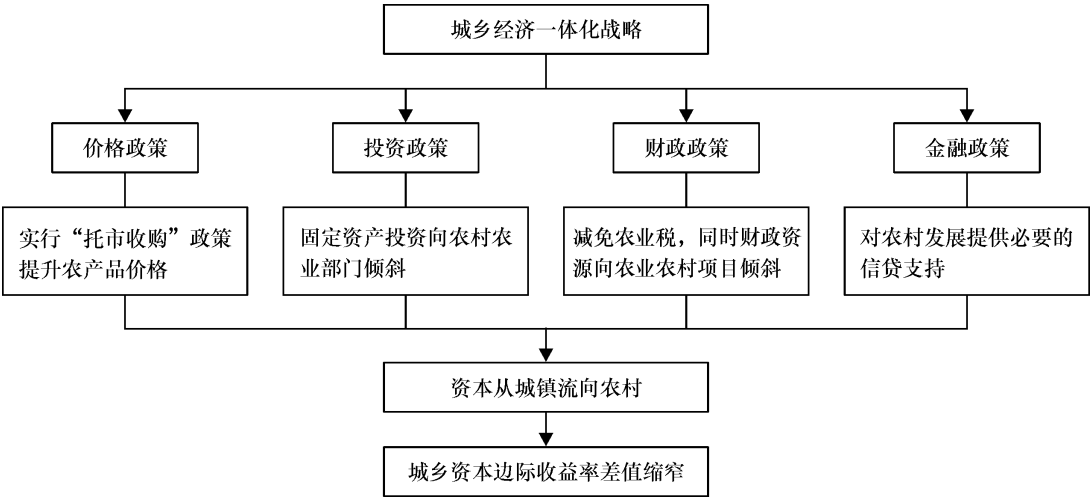


图2 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影响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值的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段时期内，经济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并非由某单一因素或发展倾向所决定，而是在诸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因此，城乡资本是否得到有效配置，即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的扩大与收窄取决于在两种发展倾向下，实施多重政策的共同影响。

三、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的测算方法

（一）模型设计

为估算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本文借鉴辛祥晶等[2]、褚保金等[9]和周月书等[10]对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_t = L_t^{\alpha} \cdot A_t K_t^{\beta} \tag{1}$$

其中，Y_t、A_t、L_t、K_t 分别表示经济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α、β 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由于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考察，为消除劳动投入影响，将（1）式两端同时除以劳动投入 L_t，在不变报酬类型假设下，$\alpha+\beta=1$，则生产函数可转化为：

$$Y_t/L_t = (L_t^{1-\beta} \cdot A_t K_t^{\beta})/L_t = A_t (K_t/L_t)^{\beta} \tag{2}$$

即：

$$y_t = A_t k_t^{\beta} \tag{3}$$

其中，k_t 和 y_t 分别表示劳均资本和劳均产出。对（3）式两端取对数可得：

$$\ln y_t = \ln A_t + \beta \ln k_t \tag{4}$$

再对（4）进行计量回归，即可估算出资本弹性 β。进一步地，还可求出资本的边际收益率：

$$r_t = \partial y_t/\partial k_t = \beta y_t/k_t \tag{5}$$

(二)变量说明

本文采取农村 GDP = 第一产业 GDP + 乡镇企业增加值 ×(1 - 城镇化率)的方法来对经济产出予以衡量。其中城镇 GDP = 总 GDP - 农村 GDP。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对 GDP 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 1981—2016 年 GDP 指数(1978 = 100)和 1978 年名义 GDP 计算出历年以 1978 年为基年的 GDP 不变价格。同理,本文采取农村就业人口 =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 + 乡镇企业就业人口 ×(1 - 城镇化率)的计算方法来衡量劳动投入。其中,城镇就业人口 = 总就业人口 - 农村就业人口。

资本投入一般用当期资本存量来表示。本文采取学术界通常使用的永续盘存法[11-13]来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K_t = I_t/P_t + (1-\delta)\cdot K_{t-1}$。其中 K_t、I_t、P_t、δ 分别代表 t 期资本存量、以 t 期价格计算的投资额、t 期投资价格指数和资本折旧率。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 I_t,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 P_t。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只公布了 1991—2016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 1981—1990 年的省际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学术界通用做法,即用投资隐含平减指数来代替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其中 t 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1978 = 1) = [t 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年价格)/t 期投资隐含平减指数(上一年 = 1)]/(t - 1)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年价格),t 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均可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获取。最后计算得出 1981—1990 年投资隐含平减指数(上一年 = 1),并结合 1991—2016 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汇总。郭庆旺、贾俊雪[14]通过推算得出 1978 年中国固定资产净值为 3837 亿元,本文按此口径确定基期资本存量。折旧率 δ 按已有文献的做法取通用值 5%。

按上述方法确定中国的基期资本存量、投资价格指数以及折旧率后,便可测算出中国 1981—2016 年资本存量,并依据城乡固定投资比进一步得出中国城镇与农村资本存量。

(三)数据来源

GDP、GDP 指数、第一产业 GDP、总就业人口、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城镇化率相关数据均来自 CEIC 数据库。乡镇企业增加值和就业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与《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年鉴》。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

四、政策视角下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变动的阶段分析

利用上述数据计算分别得到中国城乡人均投入与人均产出值,将数值代入式(4),计算得到中国城镇和农村的资本产出弹性分别为 0.61 和 0.67。将中国城乡资本产出弹性值代入式(5)计算得到中国 1981—2016 年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见图 3)。

由结果可知,1981 年至 2016 年,中国城镇资本边际收益率始终保持下降的趋势,农村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则呈现先下降后增长再下降的趋势;城乡边际资本收益率的差值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到 2016 年差值缩减为 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虽然始终存在价值投资洼地,但从 2005 年开始,其投资价值相比城镇开始减少,到 2016 年,资本虽然仍能从农村获得投资回报,但与城镇相比,已不存在极差收益。从资本配置效率来看,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城乡资本配置是有效的,进入 90 年代后,城乡资本配置开始失灵。从 2005 年开始,城乡资本重新开始有效配置并一直持续至今。本文根据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的变动趋势将农村改革开放 40 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以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时序对各阶段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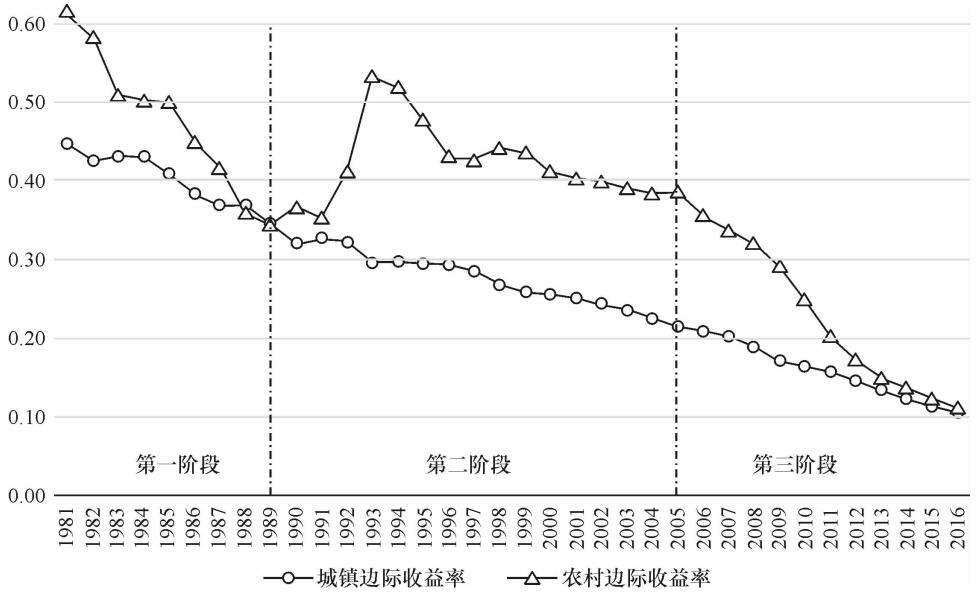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变动趋势

(一)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快速收窄阶段(1978—1989)

十一届三中全会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就此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目的是尽快解放农村生产力,加快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从1982年起,中央又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了具体部署。其中,1982、1983、1984连续三年总结、明确和巩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农业主要经营方式。1985年提出要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并开始逐步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有力地推进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中央将社队企业改组为乡镇企业,明确和肯定了乡镇企业发展所起到的"以工补农"作用。至此,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而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通过放宽对乡镇企业贷款条件进一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总体来看,在这段时期,农村发展的政策环境逐渐变得宽松。其中,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的设立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巩固使农村重新焕发出活力,统派购制度的取消使农村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在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导下,农作物的生产布局进行了有效调整,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结构,农业机械化也得到有效普及,农村的价值投资洼地效应开始凸显。一系列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政策的出台,打破了资本在城乡之间流动的行政壁垒。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不但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吸引了土地和工商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入,从而缓解了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紧张问题,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还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重点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出发点,"予多取少"的政策方针有效地解放和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也提升了农村资本投资价值,这一阶段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也获得了提升,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也相应地开始收窄。

(二)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重新拉大阶段(1989—2005)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这一阶段中国农村却与城镇的经济发展呈现差距加大的趋势。首先,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由全面短缺走向相对过

剩,国家对乡镇企业发展采取了紧缩政策,乡镇企业税收、信贷等优惠开始减少,资金更主要地靠农民自筹。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增长速度从 1991 年开始快速下降[15]。其次,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入,银行加快了商业化进程。在防范金融风险的指导思想下,金融机构上演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撤退。邮政储蓄在农村只存不贷,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在执行存款职能的同时也很少愿意承担贷款的责任。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 1989—2001 年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机构流向城镇的金额达到 2024.9 亿元,而 1990—2000 年农村资金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流向城镇的金额更是高达 25671 亿元。再次,这段时期,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税收政策却继续在加重农民的负担。比如各地允许乡镇政府自筹财政经费,地方性收费政策在执行中通过层层加码,极大地增加了乡镇企业和农民的负担。最后,在这段时期,农产品结构性供求关系矛盾逐渐凸显。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呈现出区域性、结构性和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原因在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受 1994 和 1996 年两次粮食提价的影响,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不及预期,既没有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单纯追求产量目标的特点。其本质仍然是根据市场短期需求变化而被动地进行产品结构适应性调整[16]。

总体来看,这段时期中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和国企,并采取了让农业农村来承担大部分改革成本的路径,这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前期成果[17]。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就如何搞活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税负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造成了“三农”问题凸显,导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工农“剪刀差”的政策取向,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以及城乡市场化程度差异不断拉大,这些改革政策取向造成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资本以吸储的方式“抽水机”式的从农村流向城市,使得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差异又开始逐渐拉大。在“重工轻农”的政策取向下,农村虽然资本边际收益率高于城镇,但受市场风险等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城乡资本配置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也相应地快速拉大并一直保持在较大的水平。

(三)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重新收窄阶段(2005—至今)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把多年来处于僵局之中的“三农”问题正式提升到国家宏观经济层面来解决。这标志着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18]。从 2004 年开始,中央再次连续发布旨在破解“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从这段时间开始,中央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方针,为新时期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在该阶段,逐步实施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免农业税、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培训进城务工人员、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壮大新产业新业态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政策。这十四份“一号文件”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极强的针对性,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大力发展农村新经济等方面提供了政策保障,实现了农村经济的飞跃发展。

具体来看,农村金融方面,在商业化股份化营利性银行离开农村后,农民合作金融创新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 2006 年中国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若干意见》下开展的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即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成立发展让农村融资难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缓解。财政方面,2005 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表决废除了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皇粮国税得以终结。仅减免税一项,国家每年减轻农民负担 1335 亿元。土地制度变革方面,“三权分置”创新了农

地产权制度,放活了土地经营权,允许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19]。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为农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政策不但盘活了土地要素市场,还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也对工商资本下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背景下,为解决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尤其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表明中国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正式实施。《意见》在继续强调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同时,着重提到要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要求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尽快建立和完善涉农资金的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本导向作用,通过财政资本来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可以预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保障下,未来城乡资本将会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

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中央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段时期农业和农村政策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减免乃至取消了农业税,并加大了对农民的补贴力度。中国由此正式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城乡发展新阶段。"即予又活"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带来工商业资本下乡的积极性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城市资本开始流向农村,也逐渐缩小了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在一系列组合政策的指导下,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比例逐渐增加,农村金融体系日渐完善,工商资本下乡开始成为常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体制机制的完善,城乡资本重新得到有效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资本的有效配置,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开始逐年收窄,到2016年中国农村与城镇的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已经相同,这意味着当前中国农村已不再存在价值投资洼地。如何重新提振农村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四)经验总结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三农"政策对不同阶段城乡资本配置空间演进趋势的影响,我们发现,在城镇优先发展战略下,城市偏向政策是导致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越多,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就越大,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也越低。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确立是重新提升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具体来看,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农产品和农业产业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农业补贴制度,着手解决阻碍城乡统筹的体制性因素,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构建城乡平等和完备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及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均能促进资本从城镇流向农村,有效提高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从长期来看,政府应关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对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作用,并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政策,以适应中国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要求。

五、中国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演进趋势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变动,测算和分析了中国1981—2016年城乡资本的流动趋势。结果发现:(1)中国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先高后低再变高的走势,1981—1989年城乡资本配置效率较高;1989—2005年期间城乡资本配置出现了恶化,城市资本挤压了农村资本配置空间;2005—2016年期间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基本拉平,差距

不断收窄,城乡资本配置效率较高。(2)城乡分开测算结果发现,中国城镇资本边际收益率始终保持下降的趋势,中国农村资本边际收益率则呈现先下降后增长再下降的趋势。城乡边际资本收益率的差值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至 2016 年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已经趋同,即当前中国农村已经不存在价值投资洼地。(3)从资本配置有效性来看,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城乡资本配置是有效的,进入 90 年代后,城乡资本配置开始失灵。从 2005 年开始,城乡资本重新开始有效配置并一直持续至今。城镇优先发展战略下城市偏向政策是导致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而通过从政策上扭转城市偏向,是提升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举措。

因此,就如何提高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以推动乡村振兴而言,首先,在当前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已得到较大改善,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放在资源和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置上。具体来看,政府应继续在基建、教育、医疗、社保方面,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从创新人口管理、市民化推进机制健全等方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次,从长期来看,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和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大幅收窄是中国市场化进程推进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这就需要政府在继续加大财政、金融支农的政策力度的同时,着力构建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以此为农村吸引更多的资本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最后,中国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近年来均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这说明继续单纯依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可行,经济发展模式应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而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以及提高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成为城乡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周振,伍振军,孔祥智. 中国农村资金净流出的机理、规模与趋势:1978—2012 年[J]. 管理世界,2015(1):63 – 74.

[2]辛祥晶,武翠芳. 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实证分析[J]. 求索,2007(7):22 – 25.

[3]彭小辉,史清华. "卢卡斯之谜"与中国城乡资本流动[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3):65 – 72.

[4]周月书,王悦雯. 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研究:1981—2012——基于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分析[J]. 江淮论坛,2015(1):41 – 47.

[5]高帆,李童. 中国城乡资本流动存在"卢卡斯之谜"吗? [J]. 经济学家,2016(3):75 – 86.

[6]孔祥智,涂圣伟,史冰清. 中国农村改革 30 年:历程、经验和前景展望[J]. 教学与研究,2008(9):19 – 25.

[7]陈斌开,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4):81 – 102.

[8]程开明. 从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偏向政策影响城乡差距的 Panel Data 证据[J]. 经济学家,2008(3):28 – 36.

[9]褚保金,莫媛. 金融市场分割下的县域农村资本流动[J]. 中国农村经济,2011(1):88 – 97.

[10]周月书,王悦雯.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关系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5(3):44 – 55.

[11]贺菊煌. 我固定资产实际净值率的估算[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2(12):30 – 33.

[12]CHOW GREGORY C.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3):809 – 842.

[13]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 经济研究,2004(10):35 – 44.

[14]郭庆旺,贾俊雪. 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J]. 管理世界,2004(7):22 – 28.

[15]李朝锋,张骋. 观察农村发展的四个阶段——以资金要素为角度[J]. 社会科学辑刊,2011(6):158 – 162.

[16]江小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17]姜力,李玉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的回顾和反思——基于农村经济状况演进视角[J].农业经济,2012(12):3-5.
[18]张新光.中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J].现代经济探讨,2007(1):36-40.
[19]张建刚.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将促进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实现[J].经济纵横,2018(4):119-124.

The E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JIA Jin, GAO Yuan-zhuo
(*China Western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By measuring the marginal rate of return on urban and rural capital in China from 1981 to 2016, we found that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and rural capital in China shows a high-low-high volatility feature, presenting an "inverted U" shape. On this basi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reform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nd each stage is sorted out and systematically studied by the time sequence of symbolic events, and the biased policy of reversing the prior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has been fou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to reduce the efficiency gap of capital alloc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enhance the inpu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the key to maintain the moderate and high growth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Key Words: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rural reform; rural and urban capital allo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